

## 白居易疾病诗中的维摩诘意象研究

毕可欣<sup>#</sup>, 付心怡<sup>#</sup>, 严胜英<sup>\*</sup>

文华学院中文系 湖北武汉

**【摘要】**白居易的疾病诗是其晚年诗歌创作的重要类型，亦是观照其生命态度与精神建构的关键文本。本文聚焦于白居易疾病诗中维摩诘意象的运用，探讨诗人如何借助这一带有佛教超越色彩的意象，实现对疾病体验的诗学转化与精神超越。白居易将维摩诘“示疾说法”的宗教叙事转化为个人病痛书写中的身份自觉、空间重构与意义升华，从而在诗歌中完成从生理痛苦到心灵修为、从个体困境到普遍哲思的审美提升。研究表明，白居易对维摩诘意象的创造性吸纳与内化，不仅体现其融摄佛理、疗愈自身的智慧，也彰显了中唐文人以诗为媒、整合外来思想资源并赋予其个人化表达的文学能力。

**【关键词】**白居易；疾病诗；维摩诘意象；生命困境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品牌发展研究中心 2025 年第三批项目；2024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4G45)；禅净双修与白居易诗歌创作研究；文华学院博士基金 (2024Y15)

**【收稿日期】**2026 年 2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3 月 3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114

### A study of the Vimalakirti imagery in Bai Juyi's poems on illness

Kexin Bi<sup>#</sup>, Xinyi Fu<sup>#</sup>, Shengying Yan<sup>\*</sup>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 Bai Juyi's poems on illness are an important type of his late-life poetry and key texts for understanding h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se of the Vimalakirti imagery in Bai Juyi's poems on illness, exploring how the poet used this imagery, imbued with Buddhist transcendence, to achieve a poetic transformation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of his experience of illness. Bai Juyi transformed Vimalakirti's religious narrative of "preaching through illness" into a sense of identity,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eaning in his writing about personal suffering, thus achieving an aesthetic elevation in his poetry from physical pain to spiritual cultivation, from individual predicament to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Research shows that Bai Juyi's creative absorp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he Vimalakirti imagery not only reflects his wisdom in integrating Buddhist principles and healing himself,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literary ability of mid-Tang literati to use poetry as a medium to integrate extern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endow them with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Keywords】** Bai Juyi; Poems about illness; Vimalakirti imagery; Life's dilemmas

在《白居易集》中，以疾病为题材或背景的诗作数量颇丰，已然构成其晚年创作中标志性且不容忽视的文本现象<sup>[1]</sup>。诸如“右眼昏花左足风”“肺渴多痰”等具体而微的病痛描写，不仅是对其生理状况的记录，更超越了单纯的医学史价值、成为叩问其晚年生命体验与精神世界的重要入口。若要深入解读这类“疾病诗”的内在意蕴，则必须将其置于中唐佛教思想，特别应在

《维摩诘经》广泛流播且深入文心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sup>[2][3]</sup>。该经核心人物维摩诘居士以“现身有疾”而闻名，其“示疾说法”的范式成功将疾病转化为阐释佛理的智慧媒介，为同时代文人提供了面对生命困境的全新精神资源<sup>[3][4]</sup>。白居易正是这一思想资源的敏锐接受者与创造性转化者。

宏观而言，《维摩诘经》对白居易人生态度的濡染

<sup>#</sup>共同第一作者：毕可欣，付心怡；

<sup>\*</sup>通讯作者：严胜英，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中文系教师，湖北省非遗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已获学界关注<sup>[4][5][6]</sup>。然而,若将焦点进一步聚焦于“疾病诗”这一具体文类,一个更为细微的问题便随之浮现:在其切身病痛所激发的诗性书写中,白居易究竟如何具体而富创造性地运用维摩诘意象?这一意象又如何参与其面对疾病时的身份建构、空间感知与意义生成?本文旨在通过对白居易疾病诗中维摩诘意象的细密考察,揭示诗人如何借助这一外来佛教意象实现个人痛苦体验的诗学转化与精神超越,并以此管窥中唐文人整合与内化佛教思想资源的独特文学模式。

### 1 以“净名”自居:病痛中的身份再造

面对疾病带来的身份危机,白居易最直接的策略是对“净名”身份主动认领。其诗作中多次以“净名”自喻,以此表明自身虽处世俗却追求佛理清静的精神境界。引用的修辞手段看似常见,但在白居易这里并非只是一种自称,而是一个由外在标榜到内在融合的深化过程。

早期创作中,白居易对“维摩”称谓的使用就带有明显追求群体认同的目的。在《祭中书韦相公文》中,他就以“维摩之疾”典故喻指逝者,不仅是表达对逝者的尊崇,更是在将自身所属的士人群体与维摩居士的智慧形象相联结。这种用法建立在当时文人阶层对《维摩诘经》普遍认同的文化共识之上,孟郊、元稹、王维等人的诗作中都曾提及与该经相关的内容,表明白居易并非孤例<sup>[4]</sup>。而他在《自咏》中“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sup>[7]</sup>的自我形象描绘,也带有标榜自身理想人格的意味,并融合儒释道思想做出对自己的文人身份认知。此处“居士”与道教“紫芝仙”的并置,以及“醉歌”与“坐禅”两种不同意象的调和,展现了白居易融合三教的身份想象<sup>[8]</sup>。这一阶段他的“净名”认同,还带有明显的表演性和理想化特征,是诗人在社会文化框架内进行的初步自我定位的尝试。

到了中后期,白居易对“净名”称号的运用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从外部标榜转向了内在对话。《罢灸》中就有云:“莫遣净名知我笑,休将火艾灸浮云。”<sup>[7]</sup>“净名”在此已被白居易内化为一个可与之进行戏谑对话的精神镜像。在诗中他设想净名可能正在某处看着自己,以审视和消解自身对病体的执着,并借病痛进而观照生命本质。

再看文中所使用的“莫遣……知我笑”这一假设性口吻,向外界传达了他自己的心理活动。表面上是白居易担心自己被嘲笑,实则却是他巧妙通过这种自我降格的策略,拉近了心中圣人形象的维摩诘与自己的心理距离。这种戏谑语调,恰恰标志着宗教思想的内在化

与“祛魅”:当维摩形象可从调侃中呈现,便已脱离教条束缚,成为诗人本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成功实现了让维摩诘不再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崇拜对象,而是成为一位可以与自己调侃交流的亲近友人。当众人心目中的神圣符号被自如地玩笑娱乐时,它才算是真正融入了个体的精神世界中,算是成为了诗人自我的一部分。

到了晚年,白居易对维摩意象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其标志就是他已经开始将经典符号彻底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比如《病中看经赠诸道侣》一诗就为此提供了绝佳例证。在诗中“月上新归伴病翁”这句的下面,白居易自注有:“时适谈氏女子,自太原初归。维摩诘有女名月上也。”<sup>[7]</sup>这里他将《维摩诘经》中“月上女”这个相对次要的人物,与自家刚从太原归来的女性亲属在诗中直接对应起来。这种对应并不是简单的比喻修辞,而是一种叙事层面的融合。白居易将维摩诘经典故事中的人物关系网络,直接移植到了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他通过这种方式,让维摩故事显得不再遥远,而是真切地成为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现实。这种对经典进行日常生活化的处理方法,是一种意象转化的高级阶段。在晚年白居易的笔下,维摩意象彻底脱去了其宗教神秘色彩的外壳,成为他组织自己日常生活经历的自然表达。从谈论维摩诘到像维摩诘一样生活,白居易完成了个体对维摩诘意象的最终内化。

以上三个阶段的递进可见,白居易对“净名”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他先是从社会性身份宣告出发,经过了成长后的内心对话,最终达到日常生活中将其完全融合,每一步都是对维摩意象的创造性转化,每一步都在深化其作为“病中居士”的自我认同。

通过横向比较可见,白居易的选择在一众受《维摩诘经》影响的中唐诗人中显得尤为主动。对比同样多病的元稹,其诗中反复出现“病”一字,始终将自身身体状态固于被动的客体位置。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于贬谪期间的病中抒怀,亦多将病痛与政治失意的慨叹交织,疾病本身并未成为被转化且超越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白居易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净名”这一符号将疾病“课题化”:不仅让自己得以承受住病痛,更将其转化为身份重构的一种契机。他以诗学的手段重构出兼具修行意味与自主性的“居士”身份,实现了对疾病最根本的回应——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义。

### 2 居“方丈”之境:空间局限下的精神突围

疾病的存在意味着生活与精神双重空间的被剥夺,

个体被禁锢于病榻斗室。面对这种空间的剥夺,白居易创造性地借“方丈”的意象,创作出同佛教与问疾主题息息相关的病中诗,在不改变物理尺度的前提下,通过心境的重构,将逼仄的空间转化为广阔的精神场域,实现了精神的跃升。

维摩诘对于“丈室容众”的叙事本身就构成哲学悖论:一丈见方的居室如何容纳三万二千师子座听讲佛经?而想要理解这一悖论,核心在于要去重新认识空间本质,让空间的大小不由物理尺度决定,而由心的容量决定。白居易敏锐地把握了这一要领,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空间诗学运用。

他在《小宅》中写道:“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sup>[7]</sup>白居易这首诗虽未直接提及与维摩相关的意象,但其呈现的精神内核与维摩意象中“方丈”的智慧完全相通。白居易通过对诸景物的类比联系起了一整文化谱系,将自己的思维置于传统的安贫乐道思想中,而其中“宽窄在心中”的论断则是对这一思想的哲学升华。不难看出,白居易并非否认物理空间的狭小,而是重新定义了空间的衡量标准,从客观尺度的测量转向主观感受的体验。他这种创造性的转换关键在于将宗教思想中的“小中现大”运用至神通,实现其彻底生活化。

此外,白居易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他对空间本质的颠覆性理解,更在于他对空间功能的创造性转化。在《病中宴坐》中他更是直接描绘出了此“方丈”内的真实图景:虽然处于闭户开窗的日常中,但白居易不仅能感受“小池清风”的寂静,还能有“养希夷心”的内心修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宴坐已非传统佛教中形式化的静坐,而是一种“心性宴坐”。维摩诘当年批评舍利弗“林中宴坐”是因其拘泥场所形式;白居易的“病中宴坐”则重神髓而轻形迹——不拘外在坐姿、环境,只问内心修养。这种“宴坐”是对维摩智慧的深层回应,将病室从物理限制的场所,升华为修心养性的精神道场。在白居易的“宴坐”中,狭小的病室被升华为了一个容纳起居、禅思与情感等众多功能的生命道场,从束缚之地变为了精神之源。

除了对空间的理解,白居易运用空间诗学的最高明之处,在于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在受限病体中依旧能实现精神力量的独特思维模式。这套模式重点在于白居易通过对自己心境的调整,做到改变主体与空间的结构关系,从而使他能够在物理局限中也开拓出精神自由。比如在《何处春先到》中,虽然仍处于病中,白居易的注意力却可以从自身的病痛转向外部世界的细

微变化,像是“冻花”的开放、“莺语”的悦耳。他这种注意力的外向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对空间感知的重构。他将自我从病房空间中被束缚的囚徒这一位置,调整为自然环境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从根本上摆脱肉体对自己的约束。

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这种空间重构方法还具有极佳的积极情绪作用。像是在《病中逢秋招客夜酌》中,他就直言:“不见诗酒客,卧来半月余。合和新药草,寻检旧方书。”<sup>[7]</sup>将病室写为一个他进行知识整理的学习场所。在他的写作下,合和新药是医学实践,寻检方书是知识梳理,而招客夜酌则是社交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白居易即使身带病痛,也可以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白居易正是通过诗词向世人实践证明,物理上的卧床限制,反而能催生出这些有意义的精神生产活动。

这种在局限中开拓精神维度的能力还颇显白居易自身的特色。相比于同时代诗人,李贺于“闭门感秋风”中将空间固化为心灵封闭的牢笼,杜甫在“万里悲秋常作客”中将空间延展为无边漂泊的象征,他们的空间书写倾向于强化外在环境对主体的压迫性存在。然而,白居易以“方丈”为精神据点,从根本上实现逆转:他凭借对维摩智慧的深刻体认与个人化的诗意转化,不仅消解了物理空间的压迫感,更赋予空间一种主宰性。在他笔下,空间不再是被动承受的场所,而成为可以主动重构的精神场域;疾病带来的局限,反而成为精神自由的契机。这种从“压迫性空间”到“主宰性空间”的创造性转换,正是白居易病中诗歌空间书写的独特之处。他无需去改变物理环境,而是通过自己一套转化的哲学与“方丈”的意象合理运用,直接去重构病人与空间的关系。

### 3 悟“示疾”之法:痛苦体验的意义升华

白居易对于《维摩诘经》进行的最深刻的思想汲取,在于他由此学会了彻底重构疾病的意义。他对待疾病已经超越了去忍受或描述痛苦的表面层面,而是直接将疾病课题化,使之成为超越苦痛、通往智慧的路径。

《维摩诘经》中以“维摩示疾”为核心内容,但疾病在其中并非代表着叙事的终点,而是象征着升华的契机。白居易就深刻地把握了这一叙事逻辑,并在自己的疾病诗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和融合。

他在《答闲上人问因何风疾》中戏拟“文殊问疾”的典故:“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sup>[7]</sup>这句诗包含着一个逻辑上的转折:如果只有达到四禅天的境界才能免除风疾,而我又尚未达到此境界,那么当

下的风疾就不再是偶然的灾祸,而是修行不足的证明和精进修行的动力。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疾病的属性,疾病从需要被同情的他人视角,转变为需要被理解的自我磨炼。正揭示了白居易面对疾病的终极认识:真正的“免灾”在于精神境界,而非肉体无疾。这是对《维摩诘经》“不二法门”中“消解病与不病对立”思想的生动运用。

而《眼暗》一诗中更是有云:“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sup>[7]</sup>这首诗前两句对病状的描写越是生动具体,这后两句的转折就越具感染力。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切外疗成为无效,白居易的选择坚定转向向内的“学头陀”。而这里的“学头陀”不是指形式上的要求病人去出家,而是要求对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变。让病人从依赖外部治疗转向内在修炼,从追求消除症状转向理解本质。经这种转化过后,疾病不再是需要被驱逐的烦恼,而是成为了促使主体改变认知模式的催化剂。

同时,白居易疾病诗的哲学深度,还集中体现在他对维摩诘“不二法门”的实践运用上。“不二法门”智慧的精髓在于其中消解二元对立,在看似矛盾的事物中看到统一的思想。而在常规的疾病体验中,最大的二元对立莫过于“病”与“不病”、“苦”与“乐”的这两种对立。白居易则是致力于通过诗歌创作,在实践创作中去实现融合这些对立关系。

在《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中“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sup>[7]</sup>虽然此诗不全篇主写疾病,但其“一贯无两端”的哲思正是“不二法门”的表达。当白居易将这种哲学应用于疾病体验时,病与不病、苦与乐的绝对对立就被解构了,疾病被纳入更广阔的精神统一体中。

白居易在疾病诗学中的最终成就,则是他将疾病体验升华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境界。这在《琵琶行》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sup>[7]</sup>一句最能展现,尽管此诗主题并非疾病,但其中对“无声”之境的审美提升,在精神层面可与维摩“默然无语”所象征的超越境界相参照,二者在此理路上深刻相通。若再将这句诗的内涵延伸至日常的疾病体验,我们就意外地可以发现白居易在某些时刻正是将自己带入一种“此病无苦胜有苦”的境界。但这种境界也并非夸张地去指痛苦感消失,而是白居易通过哲思,达到了一种能够包容乃至超越痛苦的至高境界。白居易的疾病诗,也因而成为了一种建立于苦难上的升华艺术,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具有普遍审美与哲学价值的文学结晶。

同样在《夜哭李夷道》中,他也写道:“逝者绝影

响,空庭朝复昏。家人哀临毕,夜锁寿堂门。无妻无子何人葬?”<sup>[7]</sup>这首诗虽是为悼亡而作,但白居易于其中对死亡、孤独的深刻探讨,与他在疾病诗中面对生命衰败的体验呈现息息相通。白居易不断在诗作中通过对这些人生终极问题的美化表达,使个人痛苦获得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

在此之中,白居易最深刻的审美转化在于他对自身老病形象的大胆塑造上。在他晚期的《览镜喜老》中,白居易已经能够直言:“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多生时。”<sup>[7]</sup>这是一种对衰老坦然接受的积极心态,也正是对于他此前疾病诗精神的逻辑延伸。他清晰地传达出如果疾病和衰老终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唯一的超越方式就是赋予它们积极的意义和美的形式。

白居易这一将疾病哲学课题化倾向的写法,在中唐的同类诗作中显得思想层次颇高。比如杜甫在《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手提掷还崔大夫”所流露的无可奈何,或李商隐将病痛融入朦胧表达的幽微方式,这些作品的核心仍是苦难诉说或情感寄托。而到白居易这里,他却能借助维摩意象的“示疾”作为创作框架,将疾病本身变为一个可被冷静讨论、并可从中提炼出生命智慧的文本。由此可见,白居易创作疾病诗追问的始终是“此病何以悟”,而非“此病如何除”。这种从除病到悟病的思维转向,成为其精神自救中最深刻的一环。

#### 4 结论

通过对白居易疾病诗中维摩意象的系统分析,可以明显看到一条清晰的白居易精神上的深化路径:首先在身份维度上,他通过对“净名”这一称谓不断内化,实现了从追求被社会标榜到实现维摩意象与自身生活融合;在空间维度上,他通过“方丈”意象来实现心境的扩宽,实现了将物理上的禁锢转化为生产精神的综合道场;最后在意义维度上,他通过借用维摩诘的“示疾”思想为主题实现诗作意义的进一步升华,实现了让疾病从生理苦难转变为修行课题和审美对象。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挖掘白居易这一转化过程的本质,其实是一场以诗歌为媒介的精神自救。在转化的过程中,白居易不是被动地去接受维摩诘思想的影响,而是主动地将其作为诗词创作的材料,进行精心的挑选和有意识的运用,从而才使之成为能够有效应对自身生命困境的意象工具。正是这套疾病诗创作系统的建立,使他能够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依旧保持精神上的坚韧和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

白居易疾病诗中的维摩世界,最终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古代文人的精神高度: 在生命最脆弱、最受限制的病痛境遇中, 古代既无太多消遣娱乐方式也无先进医疗技术, 他依然能够通过诗学创作不迷失自己的主体性, 将外在的苦难转化为内在的财富。他的诗歌早已不不仅是疾病的记录, 更是对疾病的超越; 不仅是痛苦的表达, 更是对痛苦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 白居易晚年的病榻, 确实成了他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道场。

#### 参考文献

- [1] 谢思炜. 白居易集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2] 严胜英. 近百年来《维摩诘经》研究综述[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2).
- [3] 张海沙. 唐代文人与《维摩诘经》[J]. 文学评论, 2011(1): 68-78.
- [4] 孙昌武.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
- [5] 何剑平. 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 [6] 张俊梅, 靳浩辉. 《维摩诘经》对白居易人生态度及诗风的影响[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25(1): 107-109.
- [7] 谢思炜. 白居易诗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 [8] 李乃龙. 白居易道教信仰的嬗变历程[J]. 东方丛刊, 2001(1): 138-151.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